

〔日〕竹内实 著
韩凤琴 张会才 译

毛泽东传记三种

竹内实文集

第四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毛泽东传记三种

竹内实文集 第四卷

〔目〕竹内实 著 韩凤琴 张会才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传记三种〔日〕竹内实著;韩凤琴,张会才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

(竹内实文集;第4)

ISBN 7-5059-3936-X

I. 毛… II. ①竹…②韩…③张… III. 毛泽东(1893~1976)—传记 IV. A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288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1—4131 号

书 名	毛泽东传记三种——竹内实文集·第四卷
作 者	〔日〕竹内实
译 者	韩凤琴 张会才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孙国勇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32 千字
印 张	10.375
插 页	3 页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115 册
书 号	ISBN 7-5059-3936-X/1·3050
定 价	18.80 元



作者像

《竹内实文集》

编译出版说明

竹内实是目前日本最著名的中国学家之一，被当今日本学术界称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处于开创者和泰斗的地位。

竹内实 1923 年 6 月 12 日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父母原从日本的爱知县去那里以经营旅馆谋生。父亲去世后，由母亲独自支撑家业。他曾在当地日本人办的小学里读书，并从三年级起向中国人学习中文，由此为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扎实的汉语基础。1934 年，他随母亲移居到中国东北的长春，在那里读完小学和相当于初、高中的商业学校。1942 年回日本后，进入二松学舍专门学校。在这期间，他曾因当时日本政府从在校学生中征兵而入伍，所幸因病未去前线。1946 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毕业后转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仓石武二郎学习中国文学。此后，他先在中国研究所做研究，继而去东京都立大学任教，同时积极参加日中友好运动。当时，他三次访问中国，并会见过毛泽东。自 1973 年以后，竹内实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与所长、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北京日本学中心主任教授，以及松阪大学、关西大学、中国西北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等客座教授。

竹内实是在日本战后最早开辟现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学者。他立足于促使日中两国人民在真正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友好往来的宗旨,从讲授中国语和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进而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历史、文化,其关注的范围逐渐扩大,学术水平也日益受人瞩目。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到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始终保持着冷静分析的眼光,以不随波逐流的批评姿态,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鹤立鸡群。此外,他在批判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促进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等历史进程等方面,也都曾因远见卓识而醒人耳目。其学术成果不仅在国内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基于在战后的中国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先后荣获日本福冈第三次亚洲文化奖和日本政府颁发的勋章。这标志着中国研究的地位在日本学术界的确立与提升。

竹内实的学术风格雅俗共赏,所发表与出版的关于中国和日本关系的论著数量惊人。竹内实一直企盼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接受中国社会与历史进程的检验,并借以与中国人民相互沟通和交流。现征得作者同意与合作,从竹内实至今的全部著述中,编译成十卷本中文版《竹内实文集》在中国付梓。全套文集大体按照竹内实一生的学术经历,依其研究重点的先后顺序,分类编排,内容如下:

- 第一卷 回忆与思考
- 第二卷 中国现代文学评说
- 第三卷 毛泽东的诗与人生
- 第四卷 毛泽东传记三种
- 第五卷 日中关系研究
- 第六卷 文化大革命解析
- 第七卷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追踪

第八卷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第九卷 中国历史与社会评论

第十卷 中国文化传统探究

这是竹内实全部学术成果第一次系统选编并结集出版。在新旧世纪之交,此套文集能够首先在作者研究的对象中国面世,是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一件盛事。这既可使中国学术界具体了解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状况,也足以启发广大中国民众回顾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日两国关系的曲折变化。无论着眼于总结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成果,还是推动与深化中日之间的彼此理解,《竹内实文集》的出版,都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

本文集的编译工作,曾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力推动,并幸获日本卡乐比基金会襄助,还有诸多日本朋友从精神与财力上加以支持。这套文集,称得上是中日两国各界人士共同心血的结晶。借此《竹内实文集》出版之机,一并向曾经关注与帮助过这一工作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编译者

2001年4月

《毛泽东传记三种》内容简介

本卷收录竹内实研究毛泽东的三部论著：《毛泽东传》、《毛泽东的生涯——调动八亿人民的魅力的源泉》和《毛泽东》。

《毛泽东传》是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毛泽东语录》一书的附录。其中对毛泽东生平的介绍既简洁又充实，不仅介绍了毛泽东生活的时代背景、家庭与亲友，还评述了传主人格和思想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其在中国革命实践里的作用与地位。全文夹叙夹议，文笔流畅。

《毛泽东的生涯——调动八亿人民的魅力的源泉》一书，由光文社1972年6月25日出版。本书根据1976年9月30日第13版译出。该书按时间顺序，分章节描述了毛泽东的人生历程，刻画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的多面巨人形象。这是一本格式正规的人物传记，叙述准确、严谨，评价公允。

《毛泽东》，是1989年9月20日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新书”之一。作者独辟蹊径，以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的心理分析视角，从精神与人格的层面上，探寻了毛泽东成功领导中国革命的内在原因。书中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伟人，没有毛泽东便没有中国革命的历史。本书着眼点独特，阐释比较深刻。

作者前言

关于毛泽东,有各种评价。其中,也有人讲些极端的话。我考虑再三,还是确定依据极为平凡的事实来把握他这个人物。

所谓平凡的事实,是说他是湖南省的农民之子。

其次,他是一位学者。

首先把这两条放在心上,来探究他的人生业绩。

在考虑他是湖南省的农民之子时,我还没有去过湖南省。1988年8月,终于访问了长沙和韶山。毛泽东出生的家乡,不高的丘陵连绵不断,蓝天开阔,十分清爽。另一方面,我在想从前来过此地的日本学者究竟看了些什么?甚至有些可气。

两座毛氏宗祠,它们相隔不太远。还应该有一座,但是没有找到,或许给拆掉了吧。按照地图上的标记,一进山就该有座宗祠。虽然进里面找了,但只发现有一个大戏台。

在狭窄的地域上竟有三、四座宗祠。如果借用中国常用的说法,便可以明白那是个“封建的”地方,“封建势力”根深蒂固。

据说,毛泽东在从上海回家乡养病期间,曾借用宗祠开办过夜校。这被看成是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其实,那不是靠同族人的关系,在含糊其词中借用的吗?毛泽东在这里发展了新党员,其中两个人后来被杀害,那也许是同族人里有人告密吧。

毛泽东即使不是那样,老实说作为束缚这里村民的宗族枷锁也是严酷的。

比起阶级斗争和其他什么的,宗族的束缚是首先必须突破

的难关。

第二点,他是个学者,这是1960年他在上海接见我们时突然闪现的印象。那以后,在我的心目中不是把他看作是革命中的“猛男”(在日本把执着于一件事的人物称作“猛男”),而是视为一名学者。

1972年,中美之间建立了新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时,毛泽东是在自己的书房里会见的。他的书房,比多年来想象的要宽敞明亮,不过我还是有些失望,因为书房显得暗淡、狭窄。通过电视画面,证实了我做出的他是学者的判断。

如果把这一学者的分类进一步扩展,他便成为一位诗人。再进一步,就不得不提出他是在革命的余暇喜好诗词,还是作为诗人专心致力于革命这一疑问。我倾向于他以革命为主,诗词为辅,是余暇的消遣、爱好。然而,即使不能说全然没有那种消遣的因素,但如果看一下《诗言志》的挥毫,也不能说是简单的消遣。

不能说他想通过诗词的创作忘掉残酷的现实,他在诗词里吟咏了革命。

然而我又在这样想,他不仅吟咏了革命,还想如同吟咏诗那样完成革命,不是吗?诗与革命还是不同的吧,他从诗人的立场出发,即使是革命,也把它看成像诗一样的东西,不是吗?

不过,这始终是个模糊的疑问。

如果回到农民之子这一开始时的判定,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划分标准,我想他家该是“富农”。在我写他的传记的70年代,讲述这件事也许是个禁忌,中国出版的传记里都没有写。

然而他父亲是“富民”,这恐怕很重要。由于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贫民,他对农民无论从上面还是从下面都能够理解。如果是地主,也许沾染上蔑视农民的坏习惯;如果是贫雇农,只有对

地主的憎恨,因此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的农村。另一方面,他在少年时代帮助父亲收贷款,从中了解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通过父亲知道地主这帮家伙心里想些什么。

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没有与这样的农民的接触和对农村上下层的理解。对于他来说,农民之子是宝贵的财富。而且,他在当时的中国水平相当高的师范学校里学习五年,他不仅仅是一个农民之子,也很有修养。

为写毛泽东的传记,必须追踪他传记性的事实。我感觉通过追踪,多少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理解。

与其说他是革命家,不如叫他革命者(叫革命者,这更与其相符),他有独自的思索。因此,在做传记式的追踪时,必须理解他的思索。

这样,写他的传记不得不逐渐向其他一些方面展开。然而,与其滥发我个人的议论,不如采取罗列他的传记性的事实本身的做法更好。我努力尽量写得简明,通俗易懂。

希望读者不要把我写的这些传记当成结论。

竹内 实

2001年5月28日于日本京都

目 录

作者前言.....	(1)
毛泽东传.....	(1)
毛泽东的生涯.....	(33)
毛泽东.....	(179)

毛泽东传

竹内 实 著
韩凤琴 译

•

1949年,美国的亚洲研究家欧文·拉铁摩尔说:“亚洲已不可救药。”进而,他还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过去外国人投资比有实力的本国人投资还安全。经历过内战、外国侵略、内战再起这一二十年间的今日中国,已不可救药。”这些话即使在那十几年后的现在讲也不过时。

整个亚洲,这里暂且不提。关于“已不可救药”的“中国”,我们的关心是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其中之一就是研究毛泽东。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毛泽东并非代表中国的全部,但在考虑当今中国时,无视毛泽东恐怕是不行的。

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不到一年,便爆发了日清战争^{〔1〕},七年后,由于在山东省的一个角落掀起了秘密结社运动,即所谓的义和团事变,引起了清朝的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迁出首都北京向外疏散这一骚乱。可以说当时正处于清王朝崩溃、时代将发生剧变的前夜。企图利用君主立宪制以求更新清朝的康有为,正值36岁,精力充沛;后来推翻清朝、被尊为“国父”的孙文28岁;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21岁,鲁迅当时是13岁,还在读私塾。开创新中国道路的朝气蓬勃的能量处于沸腾之前。

毛泽东出生的时期,充满了那种风云,人心被转折时期的激烈交替所震撼。但不是说他立即直接融入那种空气之中。他首先被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家运逐渐上升的农家空气所包围。他出生时,父亲毛顺生约有一町步^{〔2〕}的土地,每年可以存上25

〔1〕 中日甲午战争——译注

〔2〕 约合9,918平方米——译注

担稻米。不久，两个弟弟出生，在二弟出生前后，祖父去世，这时家里有五口人，在中国，是个稍显凄凉的家庭。祖父去世时，父亲又买进大约四五反^{〔1〕}的土地。父亲不打算增加更多的土地，而是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的经纪人，还搞运输。家里雇了一个长工，到冬天捣米时，再临时雇一个人。从6岁起，父亲就让长子毛泽东干农活，恐怕不能说这是父亲特别严厉吧。家里好像还放债。要是自己边劳动，边雇用他人进行剥削的话，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划分上应该叫做“富农”，虽然不是像地主那样，当作彻底打倒的对象，但属于应该警惕的阶层。井冈山时期的中共，把富农和地主同等看待，采取彻底消灭政策，但是后来又转为缓和政策，最近又采取了严厉态度。

根据最近的报道，在北京的红卫兵贴出的传单里，有人攻击毛泽东的阶级出身是富农。毛泽东本人也曾说过，父亲从贫农上升到中农，然后又上升到富农。

父亲似乎是个很懂得致富之道的人。他不大量买进农民一般都想要的土地，只是不断增加其土地使用权，他的资本终于达到两三元，在拥有三百多户人家的韶山冲，被看作是大财主。不知是出于年轻时成为房屋负债的牺牲品而被迫当兵时的见闻，还是出于作为经纪人与城里商人打交道时获得的知识，他一定选择了不通过土地，而是通过货币达到致富之路。在这点上，他的见识比普通农民略高一筹。他节俭，吝惜给雇工吃肉，连鸡蛋都不给泽东吃。禁止妻子的慈善行为，拒绝与家庭成员的信仰同一步调的他的人物形象，与其说是农民，莫如说像是被商业和货币的世界夺去灵魂的人。如果中国的历史走稍微不同的道路，他大概会像日本的第一代财阀那样，作为让逸闻包围的人物

〔1〕 一反约等于992平方米——译注

而被描述。可惜的是，他在1920年去世。成为革命家的儿子，想要彻底否定自己的“资本主义道路”，肯定他连做梦都没想到。

像夏洛克那样吝啬的父亲，送泽东进私塾也是为了培养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于是父亲把不久让泽东去湘潭县城的米店当学徒的计划放在心上。之所以反对儿子不认真读经书，而去看像《盛世危言》那类介绍外国最新知识的书籍，倒不是想让儿子成为“圣人”，而是因为在一次诉讼案中巧妙引用经书的对手使他败诉。因此，对于他来说，经书倒是更实际的读物，与事业的利害得失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这样的父亲再三表示出反抗。他在追忆对父亲的反抗时，诙谐地说：“在我们家里，辩证法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既反抗私塾的顽固教师，又讨厌回家，因此也曾离家出走，后来他把那件事叫“胜利的罢课”。有一件事他记得特别清楚：

“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1〕。

然而，把毛泽东的这种反抗立刻与后来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那种反抗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恐怕与革命家毛

〔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宇佐美诚次郎译，筑摩书房出版